

第九卷

中國現代教育家傳

陳雲

中國現代教育家傳

第九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九卷，是介绍我国现代著名军事教育家的专辑。由我社特别约请《解放军报》社宋群、刘道新同志选编，作者大多是有关将领传记组的同志。所撰各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的著名军事教育家为主，同时也收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几位有重大影响的军事教育家。本书是《中国现代教育家传》这一多卷集的组成部分之一，为我国现代军事教育史提供了珍贵资料，所汇集的经验也值得广大普通教育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

第九卷

宋 群 刘道新编

责任编辑：曾 卓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展览馆路8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11.25 字数：257,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

ISBN 7-5355-0625-9/G·660

定价：4.20元

60143/32

序

09

周谷城

自1919年起到今天，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五年，我国教育工作者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些教育工作者中间，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他们是我国教育工作者的代表，他们的贡献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可以引以自豪的宝贵财富。搜集他们的事迹，给他们立传，使他们昭著于世，这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看一看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中国现代史，就会发现，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教育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最早研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教育工作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有好几位是教师；“五·四”、“三·一八”、“一二·九”等重大革命运动都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北京大学、黄埔军校、抗大、陕北公学等在中国革命中更是占有突出的地位，很多老一辈革命家、文化战士都曾从事过教育工作，有些人同时就是杰出的教育家；很多职业革命家是从学校走上革命道路的。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一批职业革命家成为教育家。中国现代教育史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特点。研究中国现

代教育史，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这一点至今尚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我们对现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非常不够，至今还没有一部权威性的、较系统、叙述较全面的中国现代教育史专著。编写中国现代教育家传，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进而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特点，将会在提供线索、搜集资料等方面起一定的作用，无疑是一项必要的工作。

今天，发展教育事业对建设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国家的重要作用，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解决教育问题列为四化建设的战略重点，这是十分英明的决策。跟一些工业发达、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教育事业还比较落后，很多方面还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教育事业面临着新的任务，要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进行改革，加速发展。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然而，我国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还比较落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我们的一些教育实践、措施，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依据，有很大的盲目性，造成很多失误。可以说，教育科学理论研究的落后，反过来成了造成我国教育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理论研究落后不等于没有理论。“五·四”运动至今，我国教育工作者培养了那么多的人才，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战士和各种建设人才，也培养出了不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专家学者。这里就有许多的成功经验，蕴藏着丰富的教育思想。我们不少教育家在教育理论方面也作了许多探索和研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问题是，从整体来看，我国教育工作者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比较分散，散见于他们各自的实践、经历之中，缺乏综合和系统深入的研究，没有形成有我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现在，在选择一批在教育实践

和教育思想理论上有重要贡献的教育家，搜集、整理他们的事迹和教育理论观点，编成他们的传记，这一工作，对于研究、建立我国现代教育科学理论体系，是不可缺少的。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计划收入一百位左右教育家的传、分册出版。至于选择标准，本书编者提出如下的意见：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上有重要贡献、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建立、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教育工作者，均将考虑收入本书。此外，材料搜集的范围、评价、编写的体例等方面，为条件所限，暂不十分苛求。相信这样作仍不失为一部有参考价值的书。希望它的出版，对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能引起更为广泛的重视。

目 录

1	刘伯承	李宗有
44	罗荣桓	李志经
73	徐向前	王文仲
96	叶剑英	张 慧 邹平波
123	何长工	苏士甲 单继友
142	陈 赓	李太昌
182	朱 瑞	高景升 孟繁宗
200	张学思	吴国良 胡序文 刘永路
216	刘善本	吴 马
233	郭兴福	夏国珞
260	季卜枚	元辉 王澍
296	张治中	程广中 高翠莲
309	杨 杰	金 钰
335	蒋方震	马 骏

李宗有

刘 伯 承



从“川中名将”到共产党员

刘伯承，原名刘明昭，1892年12月4日，即农历壬辰年十月十六日，出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乡张家坝。祖父务农，兼营铁匠。父亲刘文炳读过十多年私塾，本想通过科举出人头地，但因做过吹鼓手，在参加秀才考试的第一道县考时，即被逐出考场，还吃了一场官司，花了许多钱才算了事，家境从此中落。刘文炳文场失意，便在家务农，把藉读书发迹的希望寄托在长子刘伯承身上，省吃俭用，供他上私塾。私塾老师任贤书是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军失败后流落到川江的穷秀才，帮助他勤奋读书，指导他习武强身，使幼小的刘伯承初步树立了忧国忧民的和救国救民的壮志。资产阶级维新思潮传播到闭塞的四川内地，刘氏宗族中一位有维新思想的廪生开设了汉西书院，教授内容以数学、物理、化学等新学为主。1904年，刘伯承转入汉西书院学习。1905年，开办起县立高等小学堂，他就前往县城求学，接触了更多的新学科目，

还在课外阅读了《鹃声》、《四川》和《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进步书刊。由于他秉性聪颖，又发奋苦读，1906年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毕业于县立高等小学堂，进入夔府官立中学就读。1907年春，刘伯承因父亲不幸病故，家中陷入困境，辍学。一个15岁的少年，协助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维持七口人的生计。他除了干自己家的庄稼活外，还给人打短工、干零活，找不到活时，就到10多里远的御河沟煤场去挑煤，到赵家场街上叫卖。命运把他抛到生活的底层，推入最穷困的民众里面，促使他以新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和人生，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理想、抱负，与现有制度格格不入，民众的利益与腐朽的统治集团水火不能相容，不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中华民族就没有光明，自己也没有出路。他开始向往孙中山倡导的推翻帝制、富国强民的革命道路。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11月22日，四川革命党人张培爵、夏之时率领起义军胜利占领重庆，建立了中华民国蜀军政府。四川各地纷纷组织“同志军”、“学生军”。革命的消息传到开县，刘伯承感到欢欣鼓舞，毅然剃掉辫子，准备到万县投身“学生军”。有的亲友劝他经商，不要走论兵操戈的危险道路，他坚定地说：“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刘伯承于年底参加学生军，1912年春即以文武各课兼优的成绩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将校学堂。10个月的学习中，他对操练一丝不苟，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单独加练。对军事理论除学习规定的课程外，还广泛涉猎古代的兵书，诸如孙武、吴起、司马穰苴和刘伯温等人的著作，更是案头必备，经常阅读，初步养成了他严谨、缜密、勇猛、沉毅的性格和良好的军事素质。年底，他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提前在将校学堂毕业，被分配到同盟会会员熊克武任师长的川军第5师，很快由司务长提升为连长。辛亥革命的果

实被袁世凯剥夺去了。川军第5师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在四川举起反袁义旗，参加“二次革命”，但不足两个月便归于失败。刘伯承在作战中左脚负伤，潜回开县老家养伤，因遭通缉，避走上海。1914年秋在那里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接着参加由中华革命党组织和领导的爱国反日运动。1915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发动，他被派遣回四川组织起义讨袁，在川东集合3千余人的队伍，编为四川护国军第4支队，负责军事指挥。1916年初蔡锷指挥的云南护国军进军四川，他指挥的第4支队在川东的沿江地区以游击战的方式破坏北洋军的后方交通线，阻止北洋军兵员和物资的运送，有力地支援了蔡锷护国军的北进。3月20日攻打丰都县城的战斗中，刘伯承头部连中两弹，一弹从右边太阳穴穿入，透右眼而出，以致失去右眼，另一弹擦伤头颅。治伤期间，有人又劝他弃军经商，他决然回答：“道路既已择定，当百折而不回”。1916年夏，伤愈后在川东收容旧部，再加入熊克武的第5师，任第9旅参谋长，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至1922年历任营长、团长、旅前敌指挥官，攻成都、克重庆、战宜昌，纵横驰骋，出奇制胜，被军界人士交口誉为“军事奇才”。1923年四川讨贼战争中，他指挥第2混成旅，先用奔袭手段解决自己方面的叛军一个旅，接着又先后重创追随北洋军阀的川军两个旅，甘军十二个团，再在龙泉驿取得大捷，毙伤俘敌2000多人。从此，刘伯承“川中名将”的声名大噪。9月，在大足战斗中，右大腿负重伤，入院治疗。

刘伯承在养伤期间，开始了人生道路上的新的转折。吴玉章和四川共产党最早领导人之一的杨闇公向他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和介绍当时全国的形势，促使他思想发生深刻变化，决心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熊克武等人为了挽救危局，屡派使者劝他

重新出山，再任师长。他不为高官厚禄所动，决心随吴玉章出四川，到上海、北京、广州等蓬勃开展革命活动的先进地区考察，增加对革命形势的了解。1924年秋末，刘伯承和吴玉章等人到达上海，他看到工人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亲自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以后的重大作用，受到很大的鼓舞。1925年2月他随吴玉章到了北京，见到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负责人之一的赵世炎等，详细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和活动情况。5月初。返回上海，亲自经历了轰动全国的“五卅”运动，6月下旬，又随吴玉章到广州，见到国共合作后，广东革命政府日益巩固，革命局面蒸蒸日上，同时目睹了省港大罢工的巨大声势，中国人民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迅速地觉醒，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怒潮象火山一样地爆发，使他认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革命拯救中国的希望所在。7月初，刘伯承在参加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活动以后，同吴玉章返回四川，根据中共的指示，协助吴玉章、杨闇公等人整顿四川的国民党组织，组织国民党中的左派跟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同时，利用自己在川军中的影响，在军界和政界的中、上层进行活动，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表现出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顽强斗争精神。1926年5月，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介绍，刘伯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人民战争的“常胜将军”

入党后，刘伯承负责四川党内的军事工作。为便于在川军中活动，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工作。1926年11月，任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委员。此时，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迅速向长江流域推进。中共重庆地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策动四川军阀易帜倒戈，配合北伐进军，同时试图创造新的由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刘伯承与杨闇公、朱德一起组织领导泸州、顺庆起义，计划先争取驻顺庆和合川的三个旅首先起义，在川中站住脚跟，随即发动驻防泸州的两个旅起义，以相策应；然后把泸州起义军迅速北调，到顺庆会合，扩编为一个军六个师，以刘伯承任军长，创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11月25日，为政治上造成革命声势，以配合武装起义，国民党（左派）召开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刘伯承在会上作了军事报告，生动地描绘了北伐战争的形势，指出：“我革命军处处胜利，政府成立，不到两年，竟能将全国2/3的地面，划入革命势力的范围，这实在是一件大可庆幸的事。”还指明：“此次北伐的胜利，不完全是革命军本身的力量，而是民众拥护本党的力量”。12月初，起义先后在泸州、顺庆、合川爆发。刘伯承率合川起义军北上顺庆。在顺庆果山公园召开的誓师大会上，他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号召“各路部队团结一致，拥护和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坚持到底”。12月中旬，顺庆起义军在优势敌人围攻下，转移至开江县。1927年1月，刘伯承转至泸州，设立总指挥部，整顿军队，主办军校，建设政权，指挥作战。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各路军阀，十分仇视这股革命势力，便联合起来围攻起义军。刘伯承率三个旅7000多人英勇抗击10倍于己的敌军，在泸州城坚守了167天后，起义失败。刘伯承于5月17日黎明从泸州城外龙透关脱离险境，艰苦跋涉汉水巴山，经西安到达汉口，于7月11日到达中共中央驻地。

此时，蒋介石已于4月12日叛变革命；武汉国民党政府的汪精卫正积极策划分共，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合流；党中央领导机

构作了改组，撤消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正考虑新的斗争方针。为了组织领导南昌起义，党中央通知他前往南昌。7月27日，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会议。会上被提名他任军事团参谋长。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爆发。刘伯承协助贺龙指挥第20军攻占第5方面军朱培德的总指挥部，完全控制了南昌，他作为人民军队缔造者之一而被载入了史册。8月3日至6日起义军撤离南昌，向南进军受挫。10月2日，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在广东普宁县流沙镇召开了最后决策会议，决定重要干部和非武装人员经海路撤离，武装人员经云落北去，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坚持长期斗争。刘伯承根据会议决定，由陆丰经香港转赴上海。

刘伯承到达上海后，党中央决定送他到苏联学习。1927年11月，刘伯承等30余人到达莫斯科，他进了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在学习过程中，他首先下功夫攻克俄文关，时虽已36岁，右眼失明，学习困难很大，但毫不气馁，常常以“功到自然成”自勉，刻苦学习，获得很好的成绩。

1928年6月，刘伯承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并在专门会议上，总结了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下半年，他被调到当时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战略、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苏联内战史），军事地理、俄文等。刘伯承学习军事理论，善于和实际结合起来学，认真联系过去参加过的战斗，从中总结经验教训。1929年，中国东北军阀在日本和蒋介石政府的怂恿下，挑起了中东路事件，违反协议，独占了中东铁路的经营管理权，恶化了中苏关系。苏联红军调集兵力准备对东北军阀作战，为了配合苏军进入东北活动，苏联决定组建远东工人游击队，指定刘伯承任司令。他暂时脱离学习，到伯力组训这支600多人的工

人游击队。远东工人游击队成立后，立即开始了严格紧张的军事训练。刘伯承严格要求部属，自己身体力行，每次行动都是亲自带队。经过训练，这支由四个国家的人组成的队伍，军容整肃，士气高昂，俨然一支劲旅。由于中东路战争很快结束，远东工人游击队并未参战。刘伯承出色的军事才干和组织能力得到一致的称赞，他仍返回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学习。

1930年7月，刘伯承离苏回国，8月初到达上海，被委任为中央军委参谋长，参与策划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确定的全国武装暴动。8月下旬，中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决定停止全国武装暴动，派刘伯承去武汉任长江局军委书记。1930年年底，他调回上海，任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此时，他利用时间译校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苏军政治工作条例》、《游击队怎样动作》等，后来带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刊印，对工农红军的早期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1年底刘伯承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1月，毛泽东、朱德委任他接替何长工为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毛泽东代表中央局分配刘伯承工作时，对他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这个道理。蒋介石有他自己的黄埔系。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要镀这个红点子，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此时，红军学校一无教材，二无设备，可规模不小，学员多达两三千人，设有步兵科、政治科和特科（训练工兵和轻、重机枪、迫击炮）。面对许多困难，他毅然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在主持学校10个月的工作期间，训练了第2、3两期学员。第二期从2月1日到5月15日，第三期从6月9日到10月10日。红军学校学员是来自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干部。这种短期轮训的方法是适应当时处于频繁战争的环境的，可以较快较好地提高红军干部的军政素质，保证作战任

务的完成。刘伯承在完善教育方针、编写教材、制定教学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关于教育方针，他强调一切从红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不能够本本主义全套应用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其他军事教程。而反动军队的典范和教程，则更不必说了。他把教员组织起来，领导他们编写了一批教材，对教员们说：编写战术教材的根据是“目前红军的编制，现在的火器装备，红军作战的对象，文化程度，地理条件以及在发挥数年来游击动作中得到的宝贵经验”。教员们根据这些要求编写出教材初稿后，他亲自修改审定。为了不耽误上课时间，他加班加点，经常是在深夜里的一灯如豆下，坐在简陋的办公室的桌前，时而圈圈点点，时而挥笔疾书。在不长的时间里，编写了《步兵教程》、《炮兵教程》、《坑道教程》等十余种各科教材。在教学方法上，他针对学员文化程度低的特点，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他们学习的措施。主要有课前提问、课外讨论、重点多讲、图表配合、沙盘作业、讲练结合、纵横贯串等。他在讲解军事地形学时，示范性地运用了这些方法，他把学员带到学校附近的小山上，一面要学员看地图，一面对照实际地形、地貌，再加以讲解研究。他还根据第1、2、3次反“围剿”胜利的战例，给学员讲“十六字诀”。对于政治教育，他也给予高度重视，提出要在“军事化”、“国际化”、“苏维埃化”的三个目标下对学员及工作人员进行阶级觉悟、党的领导、阶级关系、红军宗旨、纪律与艰苦奋斗、革命理想、群众工作、革命性质与国际主义等八个方面的教育。与此同时，刘伯承还兼任瑞金卫戍司令，在军委出发到前线期间，负责主管驻瑞金的红军队伍、红军学校、瑞金县地方武装，以及警戒等事宜。

10月13日，刘伯承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在

前线指挥作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时，李德掌握了红军的指挥大权，从军事决策到组织指挥都由其个人包办。把总参谋长实际变成幕僚。刘伯承只能管管红军学校和后方医院等业务，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致力于游击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于1934年5月到9月，接连发表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文章，提出到敌人深远后方开展游击战争，迫敌回援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游击战术。10月，被李德撤掉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第5军团参谋长。16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第5军团殿后。他不顾自己身患疟疾，拖着病体协助军团领导布置行军，指挥作战。还利用行军作战间隙办起了一个随营参谋训练班，把军团司令部里粗通文墨的年轻人都组织起来，亲自给他们上课，讲授参谋业务的基本知识。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并不顾李德的反对，恢复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亲临乌江渡口，指挥强渡乌江成功，尔后又赶往遵义前线，指挥部队智取遵义。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及确立其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会后，他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组织指挥四渡赤水，亲自率领红军干部团巧夺皎平渡——金沙江渡口，保证全军及时渡过金沙江，甩掉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5月，中央红军成立先遣支队，刘伯承任司令员，他又成为全军的开路先锋。进抵彝族区时，他模范地执行红军的民族政策，和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不但使全军顺利通过，而且在彝族人民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他亲自指挥强渡大渡河，尔后率部沿河而上，直扑泸定城，有力地配合夺取泸定桥的战斗，

保证了全军渡过大渡河。6月，与红4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中共中央毛儿盖会议确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他随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左路军行动。他和朱德等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2月，在张国焘的建议下被派至4方面军红军大学任校长，实际上被撤消了总参谋长的职务。他为了全党的利益，为了培养教育好4方面军的干部，再次任劳任怨来办好学校。他亲自抓教学计划，深入学员中了解学习情况，和学员们一起参加听课，讨论；细致耐心地解答他们的疑难问题；以自己在苏联学俄语的经历，鼓励大家刻苦学习，不怕困难；每门课程结束时，亲自讲评和总结。针对当时红4方面军要在四川西康交界的峻岭湍流中行动，经常发生隘路战斗，他还认真地总结了隘路战斗的经验，写出《当前的隘路战斗》一文。7月初，红2、4方面军胜利会师，下旬，红2、4方面军分两路北上，他改随2方面军行动，任2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专门给2方面军干部讲了打骑兵的战术。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12月，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他任军委委员，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先后奔赴抗日前线。红军第4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改编为第129师，由刘伯承任师长。9月6日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后，他率第129师第769团作为先遣队东渡黄河，出师抗日。10月19日，指挥第769团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出奇制胜，首战告捷，击毁击伤敌机20余架，歼敌100余人，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在忻口的正面作战。接着，亲自指挥七亘村战斗，创造了“重叠待伏”的战法，两次伏击日军，歼敌400余人，掩护了友军在娘子关的防御战，继而在黄崖底设伏，又歼敌三百余，12月，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1937年冬，他和政委张浩，副师长徐向前，